



高等院校通识教育系列丛书

当代

西方政治思想前沿

DANGDAI XIFANG ZHENGZHI SIXIANG QIANYAN

聂露◎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高等院校通识教育系列丛书

当代

西方政治思想前沿

DANGDAI XIFANG ZHENGZHI SIXIANG QIANYAN

主 编◎ 聂 露

撰稿人◎ (以撰写内容先后为序)

聂 露 李 筠 庞金友

卢春龙 尹 钛 郑 红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6 · 北京

- 声 明
1.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2. 如有缺页、倒装问题，由出版社负责退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西方政治思想前沿 / 聂露主编.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12
ISBN 978-7-5620-7167-9

I. ①当… II. ①聂… III. ①政治思想史—西方国家 IV. ①D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85774号

出 版 者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25 号
邮 箱	fadapress@163.com
网 址	http://www.cuplpress.com (网络实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电 话	010-58908435(第一编辑部) 58908334(邮购部)
承 印	固安华明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960mm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217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定 价	32.00 元

出版说明

在高等教育中,通识教育对于人才培养具有基础性价值和决定性作用。故此,中国政法大学早在2005年就正式启动了通识教育改革,此次改革承继了20世纪90年代开启的文化素质教育。在学校“打造有灵魂的通识教育”“建设有法大特色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的两大改革目标指引下,在全校各方共同努力下,历经持续不断的艰苦摸索,学校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终于从无到有,逐渐呈现出一种科学系统且生机勃勃的发展状态。

作为一所以法学专业为主的多科性大学,学校通识教育的资源相对匮乏。对于这一客观缺陷,学校并未盲目扩张,而是凭借“专业互通”的理念开放专业课程,以其作为其他专业的通识课,如此循序渐进,补足通识教育资源。同时,学校以《中华文明通论》《西方文明通论》这两门跨学科、综合性的全校必修课为基础,打造了通识教育四大类课程体系——人文素质类、社会科学类、自然科学类、法学类。而后又进一步围绕着四大类课组,纵向建立了“通识主干课”“一般通识课”两种类型的选修课。

经过十余年的实践探索,学校对于通识教育有了更加深入、立体的理解和认识,希望通过“高等院校通识教育系列丛书”这一全新的系列教材,达成以下目标:

1. 总结过往经验,修正教学实践中发现的问题。在十余年实践过程中,广大师生对通识教育课程反馈了大量有益信息,学校认为有必要在此基础上,将渐成体系的教案加以完善,升级为更为成熟、更为系统的教材。而在教材的后续使用过程中,也会获得进一步的有关教学效果的反馈信息,使得本系列教材不断修正、完善。

2. 完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更好地服务教学。通识课的课程特性、课时等因素,导致学生在接受知识时难免有“点到为止、浮光掠影”之感。对此,学

校希望通过编写体例明朗、脉络清晰的通识课程配套教材，来帮助学生梳理所学知识，构建基本框架与知识体系，从而能够在现有基础上提高教学质量。

3. 扩大影响，增加交流合作的机会。学校之所以将本系列教材命名为“高等院校通识教育系列丛书”，而未将其局限于“中国政法大学”，乃是希望通过本系列教材的推广使用，在各高校间进行教学方法、教学实践的交流互动，互通有无、集思广益，将“通识教育”这一教学理念推广至全国高校，并总结、收集其在各高校的实践经验、教学反馈，对现有体系结构进行查漏补缺、更新换代的工作，以期对中国高等教育作出一定的贡献。

本系列教材的参编人员，均是从事一线教学多年、拥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其中不乏学校十年通识教育改革的亲历者。相信他们深厚的学识水平、认真的治学态度，能够保证本系列教材的质量水准。当然，由于本系列教材的编写是一次全新的尝试，书中错漏在所难免。希望广大师生在使用过程中多提问题，以便我们逐步完善。

最后，希望我们可以秉持通识教育的基本理念——“通识、博雅、全人”，服务中国高等教育，在教学中打破学科壁垒，实现知识的融会贯通；在专业培养之外注重培育学生的性情、兴趣和趣味，实现人格的健康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

中国政法大学

2016年8月

前言

这是一本研究型教材，最初是为中国政法大学通识教育主干课“当代西方政治思想前沿”而写作的。从知识脉络上，这门课是西方政治思想史、当代西方政治思想课程的姊妹篇，继前两门课程讲述的古典时代到启蒙运动、19世纪末期到二战这两个阶段之后，当代西方政治思想前沿课程侧重于讲述二战后（尤其是当代前沿）的西方政治思想。

但是，这本书又超过了仅仅为一门思想史课程写教材的要求。首先，它的主题更加广泛。二战后，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的研究有交叉的趋势，作为对此趋势的反映，这本书不仅涵盖基本的政治思想主题，如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还涉及蕴含思想性的政治理论主题，如政治文化和政治发展。其次，它的资料更加前沿。这门课在最初讲授时就强调以最新的研究作为资料来源，例如，民主专题中描述了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内容和争议，女性主义专题中介绍了酷儿理论和性别差异的科学探讨。最后，它的视角是问题导向的，这更加区别于一般的教材。本书的各个主题通常以一个核心问题作为焦点，围绕核心问题展示西方学术争论的脉络或结构。这个核心问题往往兼具学术敏感性和现实重要性，主要的争论观点也是多元化和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通过这种方式，最终使本书呈现出各个主题下的框架性知识体系。

这门课程是通识教育主干课，“通识教育”一词说明了它的授课宗旨，也说明了林林总总的知识服务于什么精神，根据什么标准被选择和组织。在我看来，通识教育和本课程有如下的关联：

第一，所谓通识教育，就是要求“知识视野宽广”。通识教育可能意味着教学体系的整体特点，意味着需要许多不同类型的知识板块相互支撑。单从当代西方政治思想前沿这一门课来讲，通识教育表现为选择当代西方政治思想的多个主题，在同一主题内选择多种不同观点，通过多元化来扩大知识的口径。

第二,通识教育还要求提供“基础性”教育。在当代西方政治思想前沿方面,一个本科大学生必须了解哪些主题,他/她的知识结构才是完整的,才能获得理解这个世界的智识基础?这是我始终考虑的问题。我的答案是基础性的主题。基础性的主题,是跨时间、跨国家、有发展、有深度的问题。所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如果不了解基础性的知识,他/她的知识版图就会存在缺陷,对政治现象就会缺乏理性认识的工具。从“不了解这个专题会怎样”的角度反复斟酌,这门课程精心选择了9个专题。

第三,通识教育有其本质的价值观念——人文主义精神,它在政治学方面可以具体概括为培养独立思考的公民观。通识教育是对人的灵魂的培养,使人热爱美德和追求思想独立。这门课也致力于培养大学生的现代公民观,使之获得人格独立、思想独立、理性和建设性参与的公民身份。

根据上述定位,这门课以专题的形式选择了二战后的9个西方政治思想主题,构成本书的主要内容。众所周知,在西方政治思想的话语中,“自由”和“民主”可能是最重要的两个概念,因此本书前三个主题就是围绕这两个概念展开的。在民主理论方面,关于“精英民主是否足够民主”这个核心问题,介绍了从精英民主到参与式民主等当代西方民主理论的争论。自由主义分为两个主题,对应着自由主义的两个方向:一是追求公平的自由主义,二是追求自由至上的自由主义。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第四个主题是共和主义,这个主题在当代中国也曾经受到广泛的讨论。第五个主题是战后西方国家观念,强政府和弱政府的西方学术争论对我国的政府发展无疑提供了借鉴。另外,由于二战后政治理论和政治思想的交融,出现了一些在研究主题上介于两者之间的重要观念,其中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发展理论构成本书的第六和第七个主题。还有一些政治思想被称为新兴思潮或社会运动,它们关注的问题由来已久,并关涉未来。在这类思想中,选择了与当下政治气候有关的绿色和平主义,以及与性别平等有关的女性主义。除了上述主题外,为拓宽知识面,针对每个主题还编写了两到三个二维码知识点,对相关学者、概念、背景等进行了信息方面的补充。

本书的撰稿人也是这门课各主题的教师,他们是中国政法大学西方政治思想研究方面的青年才俊。其中,李筠撰写了自由主义的两个专题,庞金友撰写了共和主义和国家观念的专题,政治文化和政治发展专题的作者分别是卢春龙和尹钛,郑红撰写了绿色和平主义专题,我写作了民主理论和女性主义专题,另外还担任本书的统稿和主编。这六位青年教师能够长期合作,源于其共同点——日渐

浓厚的学术兴趣、清晰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有国内国外优秀的教育背景；都力求学术严谨踏实。除了教学团队外，外邀学者也带来了精彩的课堂讲座。这门课先后邀请过景跃进、刘瑜、周濂、佟德志、刘训练、于晓虹、聂智琪、陈伟等学者，主题涉及“民主理论中的代表问题”“反极权主义和政治概念新诠释”“宪政与民主的张力”“美国的民主是金钱政治吗”等。在本书出版之际，我作为课程负责人，向上述各位的杰出贡献表达由衷的感谢，并特别致谢本书的各位撰稿人。

最后还有一个必须谈到的问题，就是学生如何学习当代西方政治思想前沿课程。下面介绍的学习方法，也是当代西方政治思想的一些研究方法，但选择哪种方法往往因人而异。选择适合自己的一种方法，或者尝试用不同方法来学习同一种知识，都会产生有益的效果。

方法之一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一种联系角度是将西方政治思想联系西方政治经验，以此了解政治思想在历史上如何产生，政治思想对社会又产生了什么影响，并根据历史语境或现代认识等不同的标准，形成对政治思想的评价。这种把思想和语境联系起来的方法，又被称为剑桥学派的研究方法。另一种联系角度是用西方理论来分析中国政治实践。建立这种关联时，一定要对特定政治思想的适用条件和主要概念进行清楚的界定。还有一种联系角度是实验性地将西方政治思想融入自己的日常实践。例如学习协商民主理论时，可以考虑在具体的事务中设计一种协商民主的规则，然后进行模拟演练，以便把握特定西方政治思想的内涵和总结适用经验的优劣。

方法之二是抽象的思辨方法。运用抽象的方法，就是去除具体的论述和有歧义的误读，把政治思想中的主要论证环节提炼出来，再组合成一个有逻辑的论证思路。西方政治思想洋洋大观，有时一种思想对应的著作累积上千万字，那么如何把握其思想精髓呢？用抽象的方法，有助于简化许多不关键的诠释，提炼出最精干的论点、论据和论证。这种方法，很适合有哲学爱好的学生。

方法之三是比较的方法。各种政治思想观念之间、思想家之间、思想的社会适用性之间等，都可以通过比较来学习其特征。例如，学习女性主义时，可以比较各种不同的女性主义观点有什么差别，有什么共同点；可以比较早期女性运动和现代女性运动的主要诉求和斗争策略有什么变化；也可以引申比较西方女性主义和中国的女性主义，什么议题类似，什么议题不同；等等。比较方法有助于掌握特定思想的特征，辨识类似的思想。

方法之四是批判性建构的方法。这个方法比较难，但是对学生来说可能也最有收获。批判性建构方法从批评和质疑开始。提出异议的基础，不是肤浅地为反对而反对，也不是没有根据地一棍子打死，而是基于经验和逻辑的检验提出疑问和错误。批判之后还要继续建构，在质疑和错误的地方提出自己的观点，发展自己的理论主张。

上述四种方法主要是对学生而言，研究者当然不局限于此。

西方的第一位政治哲学家苏格拉底曾有一句名言——“认识你自己”，强调智识生活的意义在于对自我的认识。这种对自我的认识，既强调了个人的重要性、个人在宇宙自然和社会关系中的中心地位，又提出了理性对于祛除无知的重要性，督促个人追求美德即知识的高尚生活。对当代西方政治思想前沿的学习，归根结底也是为了认识自我。但是对自我的认识，并不仅仅是内向的反省，更有价值的，是通过学习当代西方政治思想前沿的政治知识，提高自己的政治理性水平，进而立足中国，有鉴别地运用上述知识，使思想和现实融会贯通。在这个循环往复中，对自我的认识才能随之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

聂 露

2016年6月

目 录

第一讲	当代西方民主理论之争：精英民主是否足够民主？	1
第二讲	追求公平的自由主义：罗尔斯论正义	24
第三讲	自由至上主义：哈耶克论自由和法治	46
第四讲	自由、民主与国家：新共和主义是如何可能的？	65
第五讲	当代西方国家观念论争：强政府还是弱政府？	95
第六讲	政治文化的复兴	112
第七讲	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	128
第八讲	绿色和平主义：社会运动兼政治思潮	148
第九讲	女性主义：为什么女性仍然因为性别遭受不公正？	164

第一讲 当代西方民主理论之争：

精英民主是否足够民主？*

二战后，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在西方发达国家越来越稳定的同时，也逐渐遭遇越来越多的挑战。欧美的发达国家在二战后经历了经济的重生和繁荣，社会生活全面发展，政治状况稳定有序。在这些国家，即便出现过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也没有对其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带来颠覆性威胁。从基本的政治秩序上看，自由主义民主制度似乎是“历史的终结”了。但现实又表明并非如此简单，至少自由主义民主制度不断地遇到各种以民主为名义的挑战和难题。在大学校园、街头、广场和公路上，学生运动宣称反对精英主义的政治。少数族裔社群提出自己的权利诉求，争取更大的自治空间。也有民众对代议制感到无能为力，表现出政治冷漠。市场经济造成的贫富差异，更是从资源不均衡的角度摇撼着民主的社会基础。

在理论上，对西方自由主义民主赖以为基础的精英民主理论，一直存在着质疑和批判的声音。精英民主（Elitist Democracy）理论的代表人物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本人就悲观地看待精英民主的现实，他曾用个人主义民主一词来概括这种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的特点，认为个人主义的泛滥使人们在根本社会问题上的一致性遭到了破坏，而这种一致性是民主制度运行的必要条件。^[1] 二战后，围绕着“精英民主是否足够民主”的核心问题，先后出现了多元民主观念、参与民主观念、强势民主观念和协商民主观念等有代表性的民主观念，这些民主观念和精英民主观念构成了一个长时段的争论。这一讲就是聚焦上述核心问题，通过展示主要的民主观念对该核心问题的回答，尝试为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理论发展提供一个结构性、全景性地描述。

一、精英民主理论：政治是政治家的统治

先来看如下描述：

* 作者：聂露，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研究范围涉及当代西方政治思想、民主理论、选举制度、比较政治制度等。

[1] [美] 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03页。

政治就是政治家的统治。

政党和制定政策的政治家是因选民群众除一窝蜂外不能有所作为这一事实而应运而生的……政党经营和政党广告的心理技术、口号和进行曲之类并不是附件。它们是政治的精髓所在。(操纵选区的)政治老板也是如此。

普通公民是政治上的“原始人”。他们对政策普遍无知、缺乏判断力,行为迟钝、思维缺少理性,以至于在政治领域普通公民成为政治上的“原始人”。公民或者听任自己的偏见和冲动摆布,或者听任各种集团的操纵。

因此,政治竞争如同经济市场的运作,投票者如同消费者,在政治企业家提供的政策产品中进行挑选,政党如同经济领域的经济协会那样协调竞争。^[1]

这些描述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熊彼特在194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中,对当时的民主政治的描述。在这本产生了广泛影响的专著中,熊彼特从精英主义的角度提出了民主的新定义,明确了精英民主的观念。

由于精英民主观念是一种基础的民主观念,所以在分析熊彼特的民主定义之前,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它的来龙去脉。精英民主理论始于精英主义,而精英主义源远流长。从实质上可以把精英主义的历史发展概括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起源时期。在古典时代的城邦政治中,苏格拉底(Socrates)和柏拉图(Plato)都反对民主政体,主张专家治国。专家治国意味着政治精英而非普通公民对城邦事务的管治,因此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可谓是最早的“精英主义”思想家。苏格拉底曾经提出,雅典民主的缺陷在于把权力交给所有的公民,而不是有统治才能的人。他所谓的统治才能,主要是关于善、美德和智慧的知识。^[2]晚年的柏拉图提出了一种最佳政体,它融合了君主制的智慧和民主制的自由,相比苏格拉底仅仅强调专家的作用,柏拉图的思想蕴含了精英民主的萌芽。

第二个阶段是精英主义时期,也被称为古典精英主义时期。这个时期指的是19世纪的西方社会。古典精英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帕雷托(Vilfredo Pareto)、莫斯

[1] [美] 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70~394页,第413页。

[2] [古希腊] 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35页,第272~351页。

卡（Gaetano Mosca）和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这三人由于表现出共同的精神气质，因此又被称为“马基雅维利三剑客”。其中帕雷托是精英理论的奠基人，他界定了精英的概念，用精英分类和精英循环的理论解释政治革命和社会变迁。莫斯卡提出社会的两分法和政治系统的分类，断定在权威流向和官员招募方面，任何政治系统最终都会趋于精英主义。米歇尔斯论述了政党的寡头铁律，认为任何组织都存在权力向寡头集中的必然趋势，这是一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铁律。这些理论建立在认识 19 世纪西方社会经验的基础上，揭示了早期工业化社会的政治形态是精英的统治。

第三个阶段是精英民主理论时期。随着早期工业化社会发展到成熟的现代社会，选举权逐渐普及，个体的政治地位提高，政治参与规模更加广泛，西方国家进入了大众政治的时期。从精英主义的视角对上述政治发展的分析，有代表性的思想家是韦伯（Max Weber）和熊彼特。他们把精英主义和大众民主现象结合起来进行思考，提出了精英民主理论，影响了民主政治走向精英民主。此后，波普（Karl R. Popper）和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沿着精英民主的方法路径，进一步推进了理论的西化和进行了某种修正。^{〔1〕}

在精英统治和大众民主的结合方面，韦伯最早提出领袖民主的观念，认为领袖民主是超越现代社会困境的解脱办法。他提出，现代社会适用法理型统治关系，政治组织方式是科层制。科层制一方面是社会理性化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纪律机制的大量兴起。实行科层制将造成两种社会困境：意义的丧失和个人自由的丧失。那么如何解决这两种社会困境呢？韦伯的方法是，依靠卡里斯马型领袖（charisma，指超凡魅力和能力），超越层级管理的铁笼，给社会提供价值和目标。接下来的问题是，卡里斯马型领袖怎么产生？对此，韦伯提出了“公民投票的领袖民主”的方法，即领袖凭借个人影响力，赢得公民的选票，脱颖而出，成为政府领袖。公民投票使领袖获得了统治的合法性，而领袖则带领公民走向有价值和生活自由的生活。韦伯认为，现代社会的民主政治就是领袖民主制，美国总统制是领袖民主制的范例，他呼吁德国也用全民选举的方式产生总理。^{〔2〕}

〔1〕 关于精英民主理论的梳理，参见聂露：“精英民主理论的简单谱系”，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4 年第 2 期；郎友兴：“精英与民主——西方精英主义民主理论述评”，载《浙江学刊》2003 年第 6 期。

〔2〕 〔德〕马克思·韦伯：《伦理之业：马克思·韦伯的两篇哲学演讲》，王容芬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参考“以政治为业”一文。

韦伯论述的现代社会困境，很有先见之明，因为科层制以去除价值观念为制度原理，而镶嵌在科层制中的个人也易被制度同化，失去对生活意义的理解和自由的目标。这种困境即便在现代的西方社会也可能是一种潜在的危机。但是，社会理性化和大众丧失意义和自由的矛盾，能被卡里斯马型领袖从根本上解决吗？怎么保障卡里斯马型领袖具有超凡脱俗的道德水平和奉献精神，轻者缩减政治空间，损害公民的自由；重者决策失误、滥权腐败、甚至将国家导向毁灭呢？

熊彼特延续了韦伯的领袖民主思想，并在批判古典民主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竞争性精英民主理论。熊彼特认为，古典民主理论强调民主（democracy）是人民（demo）的统治（cracy）。如果人民想要统治，起码应该有作为统治者的“人民”，作为统治观念的“人民的意志”和作为统治服务目标的“公共福利”等基本要素。但是现实中存在这些要素吗？在熊彼特看来，这些要素是不存在或令人质疑的。如本讲开头所引述，熊彼特认为普通公民在政治领域中是政治上的“原始人”。他们盲目冲动而听任操纵，无法提供熊彼特所认为的统治所需要的统治者、统治意志和统治目标等基本要素。这种基本要素的缺失，造成了古典民主的困境。熊彼特认为，造成这一困境的根源正在于古典民主理论把民主看成了一种价值目标。

如果民主不是一种价值目标，那么是什么呢？熊彼特强调从经验中认识民主，也就是说，民主不是什么理想政体的目标或政治价值，而是现实中以民主的名义发生的现象、行为等的政治经验，经验上的民主是什么，它的概念就是什么。从这种经验的视角，熊彼特提出，“民主是一种政治方法……是为达到……政治决策而实行的某种形式的制度安排”。^{〔1〕}换言之，民主主要是一种政治事务的决策方法。他进一步地描述到，政党经营和政党广告的各种宣传，选举操控和政治交易的各种把戏，恰恰是政治的精义；政治精英们通过使用各种方式和手段，进行相互竞争，赢取公民的选票，使自己当选；人民的政治参与仅仅是投票，人民只有接受或拒绝未来的政治精英统治者的机会；政治精英当选后，政治将是政治精英的活动领域，人民无需也不必参与政治。简言之，政治民主是为了获得决策权而进行的选举竞争。

熊彼特在1942年发表的上述观点，既是他对当时政治经验的观察，也刻画

〔1〕〔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59页。

了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流民主实践，即自由主义民主（Liberal Democracy），又称代议制民主。^{〔1〕}经验主义大师达尔（Robert A. Dahl）曾经描述过西方发达国家的代议民主的经验内容，对这些内容进行分析可知，代议民主的理论基础是精英民主的观念。达尔对代议民主的概括主要有：①政策的制订存在两个阶段，先是公民投票选择代表，然后代表行使决策权。②投票行为之外的政治参与，由于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变得更受到限制。公民与政治领导之间的沟通不对称。③民族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差异性大。④政治专业人士取代政治业余人员，从而展现出公开角逐民选公职的竞争。⑤政党在选举中动员公民参加选举，更在政府机关中动员公职人员制定和执行政策。从达尔对代议民主的经验描述上看，公民的民主行为是投票选择代表；政党则是选举动员和政策动员的工具；经过竞选担任公职的职业化政治精英行使公共事务的决策权。达尔描述的代议民主几乎是对熊彼特的精英民主观的落实。

熊彼特还把民主政治的过程和市场消费的过程相提并论，认为政治竞争如同经济市场的运作，投票者如同消费者，在政治企业家提供的政策产品中进行挑选，政党如同经济领域的协会那样协调竞争。他认为英国是上述民主的典型。^{〔2〕}不过，熊彼特的民主观仍然没有解决韦伯所面对的质疑：如何制约政治精英？假设把政治过程等同于消费过程，如果政治企业家提供假冒伪劣产品，牺牲公民消费者的利益，消费者不可能随时投票把政治企业家选下去，那么普通消费者怎么办？如果不赞同政治过程就等于市场过程，那么政治过程和市场过程有什么内在差别，政治过程应该具有怎样的性质呢？公民个体是政治上的“原始人”吗，或者说在时间轴的分布上一直是政治的“原始人”吗？政治决策总是由精英作出吗？这些疑问都是韦伯和熊彼特的精英民主理论无法提供圆满回答的。在实践中精英民主理论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挑战。这些挑战从质疑精英民主的民主程度是否充分开始，探索民主政治的本质和经验，并提出了不同的深化民主的解决方案。

〔1〕 这里的讨论局限于二战后西方主流民主体制，认为精英民主与代议民主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但在全世界的范围内，精英民主和代议民主的关系未必是对应的。精英民主也可能表现为多元民主等形式。代议民主如果仅仅是表面形式，其理论基础也不一定是精英民主理论。

〔2〕 [美]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1章。

二、多元民主理论：民主是多重少数人的统治

20 世纪 50 年代，达尔提出的多元民主（Pluralist Democracy）理论非常流行。达尔批评了精英民主理论，提出多元民主理论作为对前者的代替。他认为，代议制民主受制于规模和参与的矛盾定律，即公民人数越多，对决策的直接参与就越少，因此越有必要把权力委托给别人。这个矛盾给代议制民主带来了参与的困境：公民无法充分地参与和控制政治精英的决策过程，政治参与显得乏力。^{〔1〕}而如果没有社会意义上的公民参与，达尔非常怀疑带有精英民主色彩的宪政制约的效果，怀疑倡导宪政制约的麦迪逊式民主。达尔不相信仅仅凭借宪法制约，就能防止暴政的出现。在批判精英民主观念的同时，达尔提出了新的社会意义上的多元主义民主观。

事实上，达尔的多元民主观与精英民主观之间的关系远非那么针锋相对，而是有更为复杂的关联。首先，达尔从精英理论中继承了两个重要的方面。第一个是经验主义民主观。与熊彼特一样，达尔区分了理想民主和现实民主，认为城邦时代的民主观念是一种理想民主。但是达尔强调，他与主张特定民主理想的思想家不同，他研究的是现实民主，是民主制度的实际运行。他采取的经验主义研究视角，与熊彼特是一致的。第二个重要的方面是，达尔接受了熊彼特的一个基本的民主观点，即民主的核心是选举领导人。根据这个核心，达尔建构了多元民主理论的 7 项基本制度，这些制度都是围绕着选举过程展开的。它们包括：^{〔2〕}

1. 宪法授权当选官员对政府的政策决定进行控制；
2. 被选官员要在经常的、公平进行的选举中接受挑选；在这样的选举中，强制是比较少见的；
3. 实际上所有的成年人都有权在官员的选举中投票选举；
4. 实际上所有的成年人都有权参加官职的竞选；
5. 公民有权就政治事务表示自己的看法，包括对官员、政府、制度、社会经济秩序和流行的意识形态加以批评，而不受严重惩罚的威胁；
6. 公民有权寻求任何其他的消息来源，而且这些消息来源同时存在并受到

〔1〕〔美〕罗伯特·达尔：《论民主》，李柏光、林猛译，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第 116～119 页，第 123 页。

〔2〕〔美〕罗伯特·A. 达尔：《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自治与控制》，周军华译，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0 页。

法律保护；

7. 公民有权建立相对独立的社团或组织，包括独立的政党和利益集团。

虽然都围绕着选举这一核心，但是多元民主观与精英民主观相比，还是有三个重要的差别。多元民主强调选举是公平和自由的过程，但是精英民主并没有这样强调，反而是允许各种操纵选举的伎俩。多元民主主张被选举权的普遍性，允许公民有机会参与选举竞争，精英民主的观点则是认为政治是政治精英的领域，被选举权对政治精英来说才有意义。多元民主重视公民的知情权、言论自由和结社权等政治权利和自由，但是精英民主对此即便不是否定的，也基本上是忽略的，精英民主并不看重公民除了选举权之外的政治权利。因此总的来看，虽然两种理论都认为民主是关乎选举的制度安排，但是多元民主比精英民主更加关注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这一点已经涉及公民的政治参与，下文中还会深入讨论。

同时，达尔也对精英民主理论提出了两个决定性的挑战。第一个挑战是，政治权力中心由精英转变为团体。在熊彼特的民主观中，作为个人的政治精英垄断了单一的政治权力中心，公民除了投票外，被放逐到政治空间之外。但是精英民主理论忽略了政治领袖和公民之间的中间地带。多元民主理论却看到，在这个广阔的中间地带，活跃着形形色色的团体。人们为什么组成团体，这些团体对选举或民主有什么影响，这些都是多元主义研究的核心问题。^[1] 达尔对这个中间地带政治现象的描述是，这里存在着形形色色的团体，这些团体为了各自的特殊利益，彼此竞争，最终产生了从长远来看总体上对公民有利的公共政策。在团体竞争的过程中，精英占据的单一权力中心被肢解了，形成了以团体为核心的多个权力中心。由于任何一个团体相对全体公民而言都是一少部分人，即“少数人”，因此多个团体之间的竞争性政治就被达尔称之为“多重少数人的统治”，即多元主义政治，或多头政治（Polyarchy）。

这种多元主义政治是通过社会制约形成的民主政治，其中社会制约是最根本的权力制约途径，也是防止暴政的必要途径。与麦迪逊民主相比，达尔认为，麦迪逊民主所强调的政治领袖之间的宪法制约是缺乏效力的，因为它只是表面形式，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是社会制约。如果没有社会制约，仅仅靠宪法制约不会产生效果；如果有社会制约，宪法制约是否还有必要，同样值得怀疑。^[2]

[1] [英] 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燕继荣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54~257页。

[2] [美] 罗伯特·达尔：《民主理论的前言》（扩展版），顾昕译，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18~19页。